

巴以冲突背景下约旦穆斯林兄弟会的角色与前景^{*}

葛宇阳 林 婧[◎]

内容提要:自成立以来,约旦穆斯林兄弟会先后经历发展、衰退与遭受镇压的三个阶段,其在约旦政治中的角色也由政权的紧密合作伙伴转变为“忠诚的反对派”,最终成为政治对手。尽管该组织已被正式取缔,但穆兄会较强的社会基础与长期秉持的亲巴勒斯坦立场仍在约旦社会中拥有较强影响力。当前巴以冲突反复、地区局势动荡,约旦穆兄会的政治影响力仍不容忽视。如何妥善处理与穆兄会的关系,既关乎哈希姆政权的统治稳定,也对约旦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安全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约旦 穆斯林兄弟会 巴以冲突 角色演变

作者简介:葛宇阳,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林婧,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作为伊斯兰政治力量,不仅深刻影响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东政治格局。在2024年9月第20届约旦国民议会选举中,由约旦穆兄会发展而来的“伊斯兰行动阵线党”(Islamic Action Front Party)赢得21席,成为约旦议会第一大政党;但2025年4月,约旦政府宣布约旦穆兄会为非法组织,逮捕其成员并查封资产,反映出王室与穆兄会关系明显恶化。2026年1月13日,美国以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和美国伙伴发动暴力袭击为由宣布将约旦、黎巴嫩和埃及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进一步压缩穆兄会在地区的活动空间。^①

历史上,约旦穆兄会以“非暴力”与“合作性”著称,长期通过合法渠道参与政治,并扮演“忠诚的反对派”角色。学界虽对穆兄会历史、理念与政治作用多有研究^②,并关注约旦穆兄会的历史发展、与哈希姆政权关系调整以及制度化政治参与等问题^③,但对新一轮巴以冲突背景下约旦穆兄会的角色变化、政治动员与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仍显相对不足。

在中东地缘重组与安全动荡的背景下,约旦穆兄会一方面借助地区局势扩大政治动员,另一方面在巴以冲突与难民问题中加剧社会撕裂,成为影响政权稳定的重要变量。穆兄会由合法到非法地位的转变是宗教、政治与安全因素交织的结果,折射出哈希姆王室在维系政权安全与社会稳定之间的艰难权衡。本文将通过梳理约旦穆兄会的历史演变与政治实践,分析其角色变化的内在逻辑,探讨这一变化对约旦政治与地区格局的影响。

^{*} 本文系2025年度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编号:202506260052)的阶段性成果。

① “Terrorist Designations of Muslim Brotherhood Chapters,”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13, 2026, <https://www.state.gov/releases/office-of-the-spokesperson/2026/01/terrorist-designations-of-muslim-brotherhood-chapters>. (阅读时间:2026年2月20日)

② 相关研究参见丁俊、马黛瑞:《中东变局中的穆斯林兄弟会》,《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刘中民、赵跃晨:《“博弈”穆兄会与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走势》,《外交评论》2018年第5期。

③ 相关研究参见赛勤、孟金霞:《浅谈约旦穆斯林兄弟会与政府的关系》,《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3期;马晓颖、刘欣路:《约旦穆斯林兄弟会与约旦政权关系分析》,《阿拉伯研究论丛》2018年第1期;Mohammed Torki Bani Salameh,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Jordanian State: Containment or Fragmentation Bets (1999–2018)?”,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6, no.1(March 2021), pp.62–80.

一、约旦穆兄会的发展历程与角色演变

穆斯林兄弟会作为现代中东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之一，政治理念建立在“伊斯兰作为完整生活体系”的基础之上，强调以宗教伦理规范社会秩序，并推动社会改革与政治参与。^① 穆兄会重视社会服务和基层组织建设，通过建立学校、医院、慈善机构等社会组织扩大社会影响，并以渐进式方式参与政治进程。1928 年穆兄会在埃及成立后，商人阿卜杜勒·拉蒂夫·阿布·库拉（Abdul Latif Abu Qura）将其传播至外约旦，并获得官方许可。约旦穆兄会总体经历发展、衰退与被镇压的三个阶段，政治角色也先后由政权的紧密合作伙伴演变为“忠诚的反对派”，最终转为政治对手。

（一）发展阶段：政权的紧密合作伙伴

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随着大量巴勒斯坦难民的流入，穆兄会希望借此拓宽影响力并与世俗组织相竞争，因此在第二任领导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赫曼·哈利法（Muhammad Abd al-Rahman Khalifa）的带领下推进组织扩张。1953 年，约旦穆兄会正式注册成为伊斯兰团体，为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提供可能性。政治强人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上台后，约旦等君主制国家成为埃及重点声讨的对象。约旦穆兄会坚定支持哈希姆政权，并与当局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此期间，约旦穆兄会一直通过参与选举进行参政。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实施戒严，并暂停国民议会运作，穆兄会虽失去参政的合法途径却仍能以慈善团体的名义继续发展。

此时，约旦穆兄会积极支持哈希姆统治的原因在于二者拥有共同的敌人与利益。一方面，双方在国内政治上互利共赢。现今的约旦哈希姆王国实为英国殖民者强行划出的“人造国家”，作为“外来者”的哈希姆家族需要借助宗教情感增加统治合法性。因此，与穆兄会合作有利于通过宗教巩固统治，削弱巴勒斯坦裔群体的族群意识^②，强化对约旦的国家认同。此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穆兄会成员也为约旦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持。同时，穆兄会借机创建了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这不仅为社会创造了就业机会，更为其构建了一个吸引追随者、维系现有成员的社会网络。^③ 另一方面，双方都存在对抗纳赛尔政权与泛阿拉伯主义的共同需要，并共享“反帝反殖”的政治诉求。侯赛因国王拒绝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抵制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反共政策，并解职英籍指挥官约翰·巴戈特·格拉布（John Bagot Glubb），这些举动赢得了穆兄会对其“反帝反殖”立场的赞赏。由于担心一旦现政权被纳赛尔主义者推翻，自身将重蹈埃及穆兄会遭镇压的覆辙，约旦穆兄会在 1970 年“黑九月事件”^④（Black September）中暗中支持国王将巴解组织驱逐出约旦，坚定维护哈希姆家族的统治。

需要指出的是，侯赛因国王并非不依靠西方的援助，而是在接受西方支持的同时，通过塑造独立于外国势力的领导人形象维护政权合法性。穆兄会则认为尽管哈希姆君主制存在诸多缺陷，但如果由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府执政，其处境将会更加艰难^⑤，故选择帮助王室抵御泛

① Carrie Rosefsky Wickham, *The Muslim Brotherhood: Evolution of an Islamist Move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22–24.

② 田鸿涛、闫伟：《从阿拉伯化到约旦化——约旦对境内巴勒斯坦民族整合道路的历史演化》，《世界民族》2025 年第 1 期。

③ Juan José Escobar Stemann, “Islamic Activism in Jordan”, *Athena Intelligence Journal*, vol.3, no.3(July–September 2008), p.12.

④ 1970 年爆发的约旦内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巴解组织被逐出约旦。因冲突爆发于 9 月，故也称之为“黑九月事件”。

⑤ Carrie Rosefsky Wickham, *The Muslim Brotherhood: Evolution of an Islamist Move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97.

阿拉伯主义的冲击。此后，随着共同敌人与利益的消失，二者关系开始走向对立。

（二）衰落阶段：体制内的忠诚反对派

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动摇阿拉伯民众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信心，且随着伊斯兰主义在中东的复兴，影响力不断壮大的约旦穆兄会引起当局的警惕，政府开始遏制其势力发展。理念分歧虽然使得约旦穆兄会站到政权的对立面，但由于始终坚持在体制内合法参与政治生活、不寻求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王室统治，因此成为“忠诚的反对派”。

一方面，约旦穆兄会的关注重点转为国内政治与社会议题，解除党禁后，政治诉求与政府政策日益分化，成为政治反对派。约旦穆兄会的报纸多次因发表不当观点而被封禁，政府出台新闻出版法禁止穆兄会支持的媒体参与公共事务。同时，1992年颁布的《政党法》虽然允许政党成立，但明确要求政党不得与任何外部机构建立组织或财政联系，该法案明显针对与巴勒斯坦有联系的约旦穆兄会。^①此外，为进一步防止其坐大，1993年新版《选举法》由“一人多票”原则修改成为“一人一票”原则，并将议席倾斜居住在乡村、更亲近政权的部落民众。作为回应，约旦穆兄会成立伊斯兰行动阵线党，发表政治声明《我们为什么抵制？》（Why Did We Boycott?）以示抗议，并抵制1997年大选，从而与政府关系迅速恶化。

另一方面，约旦穆兄会批评政府的以色列政策，双方走向明显对立。1991年马德里和平会议（Madrid Peace Conference）后，阿以和解开始走入正轨。1994年约旦和以色列正式签署《瓦迪阿拉巴条约》（Wadi Araba Treaty），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自约以和平后，约旦穆兄会长期批评政府的以色列政策，并公开支持哈马斯使用自杀式爆炸袭击以色列平民。在1987年第一次因提法达（The First Intifada）期间，约旦穆兄会与哈马斯相互合作导致支持率飙升，更引起约旦政府的警惕。1997年以色列特工在安曼毒杀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迈沙阿勒（Khaled Mashal）未遂^②，引发外交危机，侯赛因国王意识到哈马斯在约旦的活动并非只是政治代表，更是为招募成员而建立的实际组织基地，故决心驱逐哈马斯、镇压约旦穆兄会。

（三）镇压阶段：遭到打压的政治对手

侯赛因国王视穆兄会为政治问题，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则视其为安全问题。^③自即位以来，约旦国内外的安全格局发生多次变动，在国家安全的逻辑下，哈希姆政权视穆兄会为政治对手，开始实施更为强硬的打压与遏制政策。

第一，约旦政府配合美国中东“反恐”战略，以“反恐”名义打击穆兄会成员。“9·11”事件的发生使得美国在中东发动“反恐战争”，约旦既担忧穆兄会传播激进思想、“哈马斯化”威胁统治，又要以盟友身份积极配合美国的行动，故加强对国内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安全管控。2005年11月9日，伊拉克基地组织在安曼3所豪华酒店制造爆炸，造成多人伤亡。虽然爆炸指挥者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本身与约旦穆兄会并无任何关联，但由于4名伊斯兰行动阵线党议员参加扎卡维葬礼并致敬，政府遂以穆兄会同情扎卡维和恐怖主义为由予以逮捕。2006年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大选后，约旦传出“哈马斯会任命伊

① Glenn E. Robinson, “Defensive Democratization in Jord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0, no. 3 (August 1998), p.395.

② “Remembering Israel’s Botched Attempt to Assassinate Khaled Meshaal”, *Middle East Monitor*, September 25, 2020,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200925-remembering-israels-botched-attempt-to-assassinate-khaled-meshaal/>. (阅读时间: 2026年3月1日)

③ Joas Wagemakers,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Jord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103.

斯兰行动阵线的新秘书长”^① 的流言，随着安全部队查获隐藏的武器并逮捕多人，约旦国内舆论总体反对伊斯兰行动阵线党，政府遂趁机以涉嫌财政违规为由重新控制穆兄会建立的伊斯兰中心协会理事会。

第二，约旦政府在承诺“改革”的同时离间分化穆兄会。2010 年底，突尼斯小贩自焚引起的剧变冲击整个中东，哈希姆政权虽未被撼动，但抗议浪潮依旧席卷整个王国。在目睹多国政权更迭以及埃及穆兄会成功上台执政后，约旦穆兄会认为推动变革的时机已到，进而采取对抗态度，组织示威游行，要求限制国王权力并修宪确立君主立宪制。为维护统治，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主动恢复与穆兄会长期中断的私人接触，试图劝说其加入重组后的内阁，但遭到拒绝。约旦穆兄会以改革不充分为由抵制 2013 年大选，并拒绝加入全国对话委员会（National Dialogue Committee），继续进行示威与抗议，从而为政府实施离间与分化提供契机。持续的示威与强硬立场导致穆兄会与更倾向于妥协的盟友之间渐行渐远，并加剧内部分裂。来自约旦河西岸的“鸽派”成员担忧未来政治走向，故发表《扎姆扎姆倡议》（Zamzam Initiative）呼吁更温和与包容性的改革，结果却被穆兄会除名。为获取合法性，“鸽派”成员随即另起炉灶，新成立穆兄会协会（The Society of Muslim Brothers）并主动切断与埃及穆兄会的联系，组建独立的全国大会党（National Congress Party）。2016 年，400 名伊斯兰行动阵线党党员因意见分歧而退党，更加重组织的脆弱感与孤立感。政府则继续加大离间力度，通过合法化新成立的穆兄会协会，边缘化原组织内的“鹰派”成员，进一步瓦解约旦穆兄会的凝聚力。

第三，约旦政府大规模逮捕成员、关闭机构，彻底清除穆兄会的影响力。地区局势逐步趋于缓和后，多名约旦穆兄会高级成员“因言获罪”，穆兄会安曼总部也被安全机构查封。2020 年，约旦最高法院因穆兄会无法解决自身法律地位而裁决其“解散”，但官方并没有采取后续实际行动。而自 2023 年哈马斯与以色列冲突以来，约旦穆兄会借助冲突加强对政府以色列政策的批评，对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造成新的压力，最终被政府强力镇压。2024 年 5 月，约旦政府成功挫败一起境内武器走私案件，背后主谋被认为是同情哈马斯的穆兄会成员和伊朗支持的叙利亚境内民兵组织。尽管穆兄会一再否认与案件有任何关联，并强调在约旦境内无任何暴力意图，但政府却在密切监控该组织动向，严防任何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跨境活动。2025 年 4 月，16 人因涉嫌在约旦境内策划发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而被捕，其中 6 人承认自己是约旦穆兄会成员。^② 随后，约旦内政部正式宣布穆兄会为非法组织，查封其财产并予以取缔。当局亦对伊斯兰行动阵线党的办公室进行突袭搜查，在逮捕多位高层人员后并未全面禁止其活动。7 月 5 日，包括一名伊斯兰行动阵线党议员在内的数人因试图窃取穆兄会文件而被捕。由于涉案人员与伊斯兰行动阵线党存在组织联系，当局随后扩大调查范围，对该党及其关联机构展开审查并以行政违规、非法集资等理由处罚多家与穆兄会关系密切的慈善组织，继而再次拘捕多名相关人员，压缩穆兄会及其关联组织的活动空间。

二、巴以冲突背景下约旦穆兄会的政治影响

长期以来，巴勒斯坦问题兼具民族主义、宗教认同和国家合法性等多重内涵，外溢效应

① Janine A. Clark, “Patronage, Prestige, and Power: The Islamic Center Charity Society’s Political Role within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amer Shehata (ed.), *Islamist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Movements and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12, p.72–73.

② David Gritten, “Arrests in Jordan Over Rocket and Drone Plots”, *BBC*, 16 April, 2025,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pwzywjwgyvo>. (阅读时间：2026 年 3 月 1 日)

早已超越冲突双方，并深刻影响阿拉伯国家内政外交。在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影响下，巴以冲突的政治外溢效应日益凸显。随着以利库德集团（HaLikud）为代表的右翼力量长期执政，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日趋强硬，约以关系日益紧张，约旦国内支持和平进程的社会基础受到削弱。穆兄会则借助巴勒斯坦议题进行政治动员，将地区冲突转化为国内政治诉求，通过批评政府对美以的政策强化自身作为巴勒斯坦事业支持者的形象，从而扩大社会影响力，促使约旦政府重新审视宗教力量的政治参与与国家稳定之间的关系。

一是巴以冲突为穆兄会进行政治动员提供契机。新一轮加沙冲突爆发以来，尽管官方一直严厉谴责以色列的激进行为，但约旦穆兄会却一再指责政府仍与以色列进行合作，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不足。2024年9月8日，约旦退伍军人马希尔·贾齐（Maher al-Jazi）在约旦河西岸的艾伦比桥口岸枪杀三名以色列人后被击毙，约旦穆兄会成员公开支持该行为并视他为国家英雄。在穆兄会的推动下，约旦民众在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中与军警产生激烈对峙，示威者高举哈马斯蒙面发言人阿布·奥贝达（Abu Obaida）的头像，指责约旦军队在解放巴勒斯坦上的不作为并借机表达对国王的不满。^①

与此同时，加沙人道主义危机推动约旦国内不同反对力量形成联合，促成“支持抵抗与保卫约旦全国大会”（National Assembly for the Support of the Resistance and the Protection of Jordan）的成立。该组织成员的意识形态构成多元，涵盖左翼与右翼、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主义者，以及巴勒斯坦与约旦河东岸的政治活动人士，共同诉求皆为支持巴勒斯坦、抵制以色列。约旦穆兄会正是在巴以冲突持续激化、社会情绪不断积聚的过程中依托长期形成的社会网络和亲巴勒斯坦传统提升政治动员能力。此外，相似的意识形态也使得约旦穆兄会与哈马斯的政治立场趋同。需要指出的是，自哈马斯被驱逐出约旦后，约旦穆兄会与之保持更加谨慎的联系，但仍有部分激进成员试图将武器走私至西岸，且哈马斯一直在号召约旦民众抵抗现政权。^② 鉴于此，约旦政府重点关注二者之间潜在的政治联系，并将相关活动纳入国家安全治理范畴。

二是地区安全危机为穆兄会批评政府创造空间。此轮巴以冲突具有烈度强、波及范围广的特点，约旦安全亦难以置身事外。伊朗以以色列“罪行累累”为由对其进行多轮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以色列则誓言进行报复，两国敌对迅速升级。其间，部分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部件坠入约旦境内，甚至一度撞上居民楼。在此情况下，约旦以“保卫领空”为由对其进行拦截，反遭伊朗警告。约旦国内舆论则迅速出现分化，部分民众批评政府站在以色列的一边，认为此举将把国家拖入战争。^③

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则被认为是本次打击穆兄会行动的背后推手，约旦希望借此改善与各国的关系以换取美国和海湾国家的财政援助，由此更激化民众的不满情绪。约旦政

① Suleiman Al-Khalidi, “Jordanians Protest Against Peace Treaty with Israel in Fresh Rallies”, *Reuters*, March 29,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jordanians-protest-against-peace-treaty-with-israel-fresh-rallies-2024-03-29/>. (阅读时间：2026年3月1日)

② Nidal Adailah, “What about Abu Ubaida’s Call on Jordan to Escalate Popular Mass Action?”, *Middle East Monitor*, November 25, 2023,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231125-what-about-abu-ubaidas-call-on-jordan-to-escalate-popular-mass-action/>. (阅读时间：2026年3月1日)

③ 约旦之声，《拦截伊朗、放行以色列——谁在企图把约旦卷入战争？》，<https://jordan-voice.com/%D8%A7%D8%B9%D8%AA%D8%B1%D8%A7%D8%B6-%D8%A7%D9%84%D8%A5%D9%8A%D8%B1%D8%A7%D9%86%D9%8A%D8%A9-%D9%88%D8%A7%D9%84%D8%B3%D9%85%D8%A7%D8%AD-%D9%84%D9%84%D8%A5%D8%B3%D8%B1%D8%A7%D8%A6%D9%8A%D9%84%D9%8A/>. (阅读时间：2026年3月5日)

府本意是在坚持谨慎中立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警告地区安全局势失控的危险并批评以色列来平息民怨,但以色列媒体对约旦“帮助”的大肆宣扬,反而引起更大的舆论反弹。约旦穆兄会趁势加大抨击政府的力度,继续动员社会舆论。在其推动下,示威者要求军方对敌人采取报复行动,社交媒体甚至一度流传出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身披以色列国旗的“叛徒”形象照片。^①

三是圣地管辖权问题赋予穆兄会反对政府的宗教合法性。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其实质是阿克萨清真寺(Al-Aqsa)的最终归属权问题。^②自1924年被赋予耶路撒冷圣地管辖权以来,哈希姆家族一直负责圣城耶路撒冷与圣寺阿克萨清真寺的修缮与监管,并将圣地管辖权视为王室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1994年约以和平条约签订时,以色列明确承诺尊重约旦哈希姆王国在耶路撒冷穆斯林圣地中的特殊作用,然而事实却是以色列当局一直在破坏圣地现状。以色列以“考古”和“旅游开发”的名义肆意改变城市原有地貌,损毁历史遗迹,企图推进圣城的“犹太化”,并以“安全”和“信仰”为由,强制封锁、关闭圣寺、阻止穆斯林正常祷告并强行在此举办犹太宗教仪式,意图完全控制阿克萨清真寺。^③

美国对以色列的持续偏袒也使约旦在圣地问题上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就将驻以色列大使馆强行由特拉维夫搬迁至耶路撒冷,并公布将阿克萨清真寺划归以色列、严重侵犯约旦圣地管辖权的“世纪协议”(Deal of the Century),引发约旦民众的强烈愤慨。2020年美国促成阿联酋与以色列签署的《亚伯拉罕协定》(Abraham Accords)中强调“所有为和平而来的穆斯林都可以参观阿克萨清真寺并祈祷,耶路撒冷的其他圣地也应该继续向所有信仰和平的信徒开放”^④,从而为非穆斯林在圣寺的祈祷创造政策条件,为以色列改变圣地现状提供政治空间。在美国的背书下,以色列更加频繁地侵犯圣地现状,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多次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并祈祷,引发极大争议。根据圣殿山组织(Temple Mount groups)的数据统计,在过去一个希伯来历年中^⑤,共有58,310名定居者闯入阿克萨清真寺,较上一年增加14%,是十年前的5倍。^⑥此外,美国也希望通过变更圣地管辖权来吸引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媾和。多年来沙特一直试图通过增加在耶路撒冷瓦克夫(Waqf)的代表权逐步取代约旦的圣地管辖权,在特朗普的推动下,沙以两国密谋以赋予利雅得对耶路撒冷官方的管辖地位来换取两国关系正常化。圣地现状持续遭到破坏引起约旦穆兄会的高度关注,其批评政府在监管上的不足与回应软弱,并借此塑造伊斯兰利益捍卫者的政治形象。伊斯兰行动阵线党多次提案要求驱逐以色列大使,不断提升自身在宗教议题上的社会影响力。

四是冲突外溢与民生困境为穆兄会扩大选民支持提供条件。巴以冲突的持续外溢不仅对

① Patrick Wintour, “Jordan Faces Difficult Balancing Act Amid Row Over Role in Downing Iranian Drones”, *The Guardian*, April 15,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4/apr/15/jordan-difficult-balancing-act-row-downing-iranian-drones-israel>. (阅读时间:2026年3月5日)

② 丁俊:《阿克萨清真寺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③ 葛宇阳:《巴以冲突背景下约旦对耶路撒冷圣地管辖权的困境与展望》,《阿拉伯世界研究》2025年第1期。

④ Juman Abu Arafah, “How the UAE-Israel Deal Seeks to Impose a ‘Fait Accompli’ in Jerusalem”, *Middle East Eye*, September 11, 2020,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jerusalem-al-aqsa-palestinians-uae-israel-deal-fait-accompl>. (阅读时间:2026年3月5日)

⑤ 按照希伯来历计算,统计时间应为2024年10月2日至2025年9月22日。

⑥ “Hundreds of Israelis Storm Al-Aqsa Mosque on Jewish New Year”, *Middle East Eye*, September 23, 2025,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hundreds-israelis-storm-al-aqsa-mosque-jewish-new-year>. (阅读时间:2026年3月5日)

约旦安全环境造成冲击,也使长期存在的经济和社会治理问题更加凸显。从中东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困难本身难以充分解释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发展,但在政府治理能力下降、国内外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伊斯兰主义力量更容易借助既有组织能力和意识形态重新获得社会支持。^①地区安全局势反复动荡、新冠疫情冲击以及加沙冲突外溢对旅游业的影响,共同导致约旦本就低迷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国内示威抗议规模不断扩大,社会不满情绪持续累积,从而为穆兄会借助巴勒斯坦议题开展政治动员提供了条件。

除内部压力外,美国援助政策的变化也加剧约旦的经济困境。历来美国政府都视约旦为“安全的绿洲”,约旦的安全与稳定也离不开美国的军事与经济援助。而自上任以来,特朗普政府却不断破坏约旦在维持地区安全与稳定中的特殊作用,乃至以援助金额为筹码施压约旦配合美国的中东政策。尽管两国曾在2022年签署合作备忘录,美方承诺每年向约方提供价值至少14.5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被强制关闭后,约旦未被纳入豁免项目之列。特朗普总统更是表示,如果约旦和埃及不接受巴勒斯坦难民的话,他将会停掉对两国的援助。^②美国援助的减少严重冲击约旦的经济稳定,导致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大幅上升,失业率居高不下,民生状况进一步恶化。

在经济压力与社会不满持续累积之际,约旦穆兄会通过将民生困境与地区冲突关联,激化民众对以色列和美国的不满情绪,并借助民族主义话语指责政府的不作为。在其宣传中,停止与以色列开展商业合作、调整对以政策,不仅被视为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重要方式,也被塑造为维护国家利益、回应民众诉求的现实选择。^③不满情绪同样蔓延至美国,根据“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的数据,约旦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仅为28%。^④约旦穆兄会借此继续激发民众反美情绪,组织民众无视政府禁令前往美国和以色列大使馆门前进行游行示威,并施压政府结束与美国的军事合作。2021年美约签订共同防务协议,允许美军自由出入约旦领土并携带武器进行作战任务。伊斯兰行动阵线谴责该协议“公然侵犯约旦主权”,并称其是“浪费约旦烈士的鲜血”。^⑤

三、巴以冲突背景下约旦穆兄会的发展前景

约旦穆兄会被取缔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近年来中东国家不断调整国家安全与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重要缩影。中东剧变后,中东各国对政治伊斯兰的政策取向持续调整,宗教与世俗

① Melani Cammett and Pauline Jones Luong, “Is There an Islamist Political Advantag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7(May 2014), pp.194–198.

② Shannon K. Kingston, “Trump Says He Could Withhold Aid from Jordan and Egypt If They Reject His Gaza Development Plan”, *ABC News*, February 12, 2025,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trump-withhold-aid-jordan-egypt-reject-gaza-development/story?id=118668060>. (阅读时间: 2026年3月8日)

③ “Jordan’s Islamists, Buoyed by Anger Over Gaza, Seek to Shake Up Parliament in Election”, *Middle East Monitor*, September 9, 2024,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240909-jordans-islamists-buoyed-by-anger-over-gaza-seek-to-shake-up-parliament-in-election/>. (阅读时间: 2026年3月3日)

④ “Arab Barometer Reveal Findings from Major Jordan Survey”, *Arab Barometer*, September 17, 2024, <https://www.arabbarometer.org/media-news/arab-barometer-reveal-findings-from-major-jordan-survey/>. (阅读时间: 2026年3月8日)

⑤ 伊斯兰行动阵线,《与美国的国防合作协议违反宪法,公然侵犯国家主权》, <https://jabha-jo.com/%d8%a7%d9%84%d8%b9%d9%85%d9%84-%d8%a7%d9%84%d8%a5%d8%b3%d9%84%d8%a7%d9%85%d9%8a-%d8%a7%d8%aa%d9%81%d8%a7%d9%82%d9%8a%d8%a9-%d8%a7%d9%84%d8%aa%d8%b9%d8%a7%d9%88%d9%86-%d8%a7%d9%84%d8%af%d9%81/>. (阅读时间: 2026年3月8日)

之间的平衡再次被重新界定。面对地区安全风险外溢、巴以冲突长期化与宗教力量影响上升等挑战，各国普遍更加重视国家安全与政权稳定，加强对宗教力量的约束。然而，以穆兄会为代表的宗教力量并不会因组织层面的取缔而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其发展仍深植于社会网络、宗教认同和地区议题之中，约旦穆兄会的未来走向仍值得密切关注。

（一）组织调整与社会延续

伊斯兰行动阵线党的设立旨在对穆兄会的活动进行制度化规范，通过将政治参与与宗教宣传相区分而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此举不仅有助于扩大穆兄会的行动空间，吸纳更广泛的民意基础，也为在母组织遭受打击时维持自身政治运作。在约旦穆兄会被查禁之初，伊斯兰行动阵线党就否认与之有任何关联，并表示愿意配合当局的调查。此外，行政取缔只是改变穆兄会的法律地位，却并未切断长期形成的社会联系和组织惯性。依托多年积累的社会网络和组织信誉，穆兄会仍能以更加分散、隐蔽的形式继续存在。

在组织层面上，伊斯兰行动阵线党仍保有合法政党的身份，继续给予支持者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且一贯的亲巴勒斯坦立场依然拥有广泛的社会支持。根据 2022 年《政党法》的要求，伊斯兰行动阵线党更名为乌玛党（Ummah Party）。新党名称虽然淡化了“伊斯兰”的宗教色彩，却未改变该党的伊斯兰主义理念及其与穆兄会之间的联系，部分与约旦穆兄会关系密切的人士仍在新党中担任重要职务。^①更为重要的是，对约旦穆兄会的镇压不仅未必能够削弱其社会影响力，反而可能导致抗议运动的激进化。约旦官方一度指责穆兄会的国际分支为报复而袭击约旦驻外使馆及外交人员，并蓄意破坏约旦在支持加沙问题上的积极作用。^②

（二）地区动荡与外部制约

地区局势持续动荡与外部力量的政策变化使约旦面临更加复杂的安全压力，也为穆兄会延续政治影响提供新的议题资源。虽然历经多年的同化与发展，巴勒斯坦裔约旦人已形成一定程度的双向认同，但血缘纽带与对故土的深厚情感使巴勒斯坦问题在约旦保持高度敏感，被占领土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约旦国内引发波澜。^③因此，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政策也从最初的开放逐渐转向压制，既出于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可能重燃、引发国内动荡的担忧，也源于对以色列将约旦视为巴勒斯坦的“替代国”、大规模驱逐巴勒斯坦人的防范心理。

特朗普政府延续并强化对以色列的支持，使约旦面临更为复杂的外部安全环境。一方面，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推行的“世纪协议”严重削弱巴勒斯坦建国前景，将耶路撒冷主权划归以色列，剥夺难民回归权并主张收留难民的阿拉伯国家应承担将其融入、同化的责任。此举既是对以色列构建“大以色列”（The Greater Israel）的政治野心全面支持，也势必让更多巴勒斯坦难民流入约旦，加重约旦的安全负担。另一方面，特朗普提出由美国接管加沙并主导冲突后的重建工作，同时要求约旦及周围阿拉伯国家接受加沙居民，再次触及约旦长期反对“替代家园”方案的核心关切，进而使穆兄会得以继续批评政府、炒作难民问题。不仅如此，美国对穆兄会的打压也进一步影响约旦的政策选择。为维持与美国的关系，约旦相应压缩穆兄会的生存空间，而对穆兄会经营机构的关闭在增加部分群体不满情绪、推高失业率的同时，

① Ahmad Sharawi, “Jordan’s Muslim Brotherhood Wing Opts for a Cosmetic Rebrand”,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 May 1, 2026, <https://www.fdd.org/analysis/2026/05/01/jordans-muslim-brotherhood-wing-opts-for-a-cosmetic-rebrand/>. (阅读时间: 2026 年 7 月 13 日)

② “Jordan Blames Muslim Brotherhood for Attacks on Diplomatic Missions Abroad”, *The Arab Weekly*, August 4, 2025, <https://the arabweekly.com/jordan-blames-muslim-brotherhood-attacks-diplomatic-missions-abroad>. (阅读时间: 2026 年 3 月 5 日)

③ 孙慧敏:《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政策及其影响因素与特点》,《阿拉伯世界研究》2025 年第 1 期。

也使外资因政局动荡而缩减在约旦的投资，加剧经济恶化。^①

（三）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

德国学者乔纳兹·格斯克乌斯基（Johannes Gerschewski）认为合法化（legitimation）、镇压（repression）和合作（cooperation）是维持威权政体统治稳定的三大支柱。^② 因此，当统治福利与社会保障有所减少时，如何处理与反对派和政治精英的关系成为维持政权长治久安的关键。对于约旦而言，穆兄会问题已不仅是单一政治组织的处置问题，更涉及国家安全、国际治理能力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复杂平衡。

其一，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的目标不仅在于维护君主专制内部的稳定，更在于强化在动荡地区向外界展示开明统治者形象。^③ 不同于邻国叙利亚、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约旦总体的政治环境相对宽容，政府也往往能够通过调整分配政策有效应对社会抗议与示威。对政治反对派保持一定程度的包容既能提供一个表达异议的渠道也能收集有关民意的宝贵信息，从而避免政治诉求转向更激烈的对抗形式。

其二，对穆兄会的全面取缔可能持续撕裂约旦社会，并引发更大的敌对。当前约旦王室与安全机构中主要存在两种思潮：一种是将以色列视为约旦生存的主要敌人，另一种则将政治伊斯兰与伊朗看作王国的主要威胁^④，两种安全认知差异也影响了政府对穆兄会问题的判断。随着巴以局势持续恶化，前一种认知逐渐占据主导地位。2026年2月15日，以色列内阁批准将西岸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登记为以色列国有财产的计划，强化约旦对大规模扩建定居点以及“替代家园”风险的担忧，部分人士因此呼吁重建与哈马斯的联系以拓展自身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影响力。^⑤ 同时，作为对以色列愈加激进的政策回应，约旦重启已中断30余年的强制兵役制度。^⑥ 相较之下，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约旦官方在受袭之后仍保持相对克制，仅进行导弹拦截与口头谴责，强调“约旦不会成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跳板”^⑦，体现出对地区局势谨慎的态度。两种安全认知的并存与博弈也加剧了约旦社会的分裂，事实上，约旦民众支持穆兄会的原因在于其坚定不移地支持巴勒斯坦事业，而非与政府进行暴力对抗。

可以预见的是，约旦社会的撕裂与政治紧张在短期内难以彻底缓解。面对安全机构、保

① “How Jordan’s Muslim Brotherhood Is Trying to Survive After US Terror Designation”, *The New Arab*, January 22, 2026, <https://www.newarab.com/news/how-jordans-muslim-brotherhood-trying-survive-today>. (阅读时间：2026年3月15日)

② Johannes Gerschewski, “The Three Pillars of Stability: Legitimation, Repression, and Cooptation in Autocratic Regimes”, *Democratization*, vol.20, no.1 (January 2013), pp.13–38.

③ László Csicsmann, “Political Reform as Regime Survival Strategy in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After the Arab Uprisings,” *Alternatives*, vol.50, no.3 (December 2025), p.564.

④ David Hearst, “By Banning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o Placate Trump, Jordan Treads a Dangerous Path”, *Middle East Eye*, May 1, 2025,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opinion/banning-muslim-brotherhood-placate-trump-jordan-treads-dangerous-path>. (阅读时间：2026年3月15日)

⑤ Mohammad Mansour, “‘Jordan Is Next’: West Bank Annexation Signals ‘Silent Transfer’”, *Al Jazeera*, February 17, 2026, <https://www.aljazeera.com/features/2026/2/17/jordan-is-next-west-bank-annexation-signals-silent>. (阅读时间：2026年3月15日)

⑥ Anwar al-Ziyadat, “Jordan Reinstates Mandatory Military Service in Wake of ‘Greater Israel’ Threats”, *The New Arab*, August 19, 2025, <https://www.newarab.com/news/jordan-reinstates-conscription-after-greater-israel-threats>. (阅读时间：2026年3月15日)

⑦ Mai Anati, “Jordan Reaffirms It Will Not Be Launch Point for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Iran”, *The Jordan Times*, February 22, 2026, <https://jordantimes.com/news/local/jordan-reaffirms-defensive-nature-of-us-military-presence-amid-regional-tension>. (阅读时间：2026年3月15日)

守势力与宗教团体的多重压力，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需要在镇压与妥协之间反复权衡，以避免社会冲突的升级。在外部环境持续动荡，国际援助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约旦不得不重新审视内部资源分配与社会动员机制。从更广阔的范围看，约旦穆兄会议题反映出当前中东国家普遍面临的政教关系调适困境：国家既需要利用宗教传统和社会网络强化政治合法性，又必须防范宗教力量转化为独立政治动员力量。而随着社会矛盾累积、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以及政治参与诉求不断增长，如何在包容与约束之间寻找平衡，已成为许多中东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考验。若治理方式过度依赖压制，可能削弱既有的政治包容机制并引发更深层次的政治危机；若缺乏有效约束，则可能强化社会矛盾与政治对立。故未来约旦政权的稳定与否仍然取决于其能否在“合法化—镇压—合作”三支柱之间实现新的平衡，对穆兄会问题的处理更是对哈希姆政权韧性的检验。

四、结语

自成立起，约旦穆斯林兄弟会经历从发展扩张到走向衰退、再到被全面镇压的阶段性演变，并由哈希姆政权的紧密合作伙伴演变为“忠诚的反对派”，最终成为政治对手。约旦建国初期对穆兄会的接纳与庇护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穆兄会既为政权提供宗教合法性支撑，协助国家巩固社会秩序并推动国家现代化，也在冷战格局与泛阿拉伯主义高涨的背景下成为哈希姆政权抵御外部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合作力量。然而，随着约旦在政治与地缘格局上发生重大转向——切断与约旦河西岸的行政联系、实现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穆兄会的政治立场与社会理念逐渐与国家主流议程相背离，依托社会动员与宗教网络形成的影响力也被视为潜在威胁，进而被纳入国家安全治理的对象之列。

巴以冲突的持续升级凸显约旦穆兄会在国内政治中的特殊作用。巴勒斯坦问题长期具有较强的社会动员效应，使穆兄会能够借助相关议题延续政治影响，也促使约旦政权关注政治伊斯兰力量与地区安全风险之间的关联。在地区局势复杂演变和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与穆兄会的关系，已不仅是单一政治组织的治理问题，更关乎约旦国家稳定与社会凝聚力的维系。即便约旦穆兄会走向式微，其所代表的社会诉求与政治参与意识仍然在各社会阶层中得以延续。倘若政治制度的包容性长期受限，部分宗教政治力量可能转向更为隐性的社会动员方式，为社会稳定带来新的挑战。

（责任编辑 周广荣）